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後，新的政治與政黨局勢對台中市地方派系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與政治能量轉變之情形。此外，並藉由 2001 年第十四屆市長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與 2002 年第十五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台中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台中市政黨輪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政黨競爭體系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政黨輪替前後派系與政黨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兩屆基層市議員選舉過程中，派系色彩與政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多元迴歸量化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派系與政黨間的新關係。經上述幾章的研究所得，本文提出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 台中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形成主要為政治資源取得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網絡，尤其在地方首長與市議會議長之激烈競逐下，所累積的政治、社經等人際網絡，再加上派系領袖個人的獨特魅力號召，漸產生派系的群組關係與凝聚力。台中市由於是消費型態的都會型城市，其派系成員色彩較鄰近縣市為淡薄，亦無尖銳對立的現象；派系之間的界線並不明顯，故成員間的流動率亦普遍。

各派系彼此勢力的轉變，主要有三個階段：(一) 1950、1960 年代派系萌芽起步與相互對峙時期。在此一時期派系的組合類型是一種以血緣、地緣、親緣、學緣等初級關係而形成的地方派系，派系成員所背負的主要社會支持來源大多是個人的初級關係，成員之間的互相結合及派系運作常是聯合地方共同政治利益勢力，打擊另一不同政治利益勢力。(二) 1970 年代派系為對

峙消長時期。因賴派創始人逝世與張派創始人退出地方政壇，張、賴兩派第二代領導人皆尚未成氣候，除國民黨運作轉變為強勢並取代派系力量外，此時亦產生了第三勢力的存在空間。但地方政壇在新舊勢力的錯綜交結下，仍舊維持以國民黨為主要領導的形勢。此時派系領導人的社會支持來源已明顯增加了職業團體與社會團體，主要關鍵是台中市因都市開發，使得外來人口增多，原有的親緣、地緣關係已不足讓派系維持或擴充社會支持，派系領導人為求開拓社會支持開始朝向多元化發展。(三) 1980 年代至今乃是派系激烈對抗轉變成派系弱化時期。1990 年代中期之後，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地方派系運用政治動員的籌碼大不如前，派系的力量相形衰落，加上民主政治的資源透明化，派系亦失去固有利益的基礎；目前台中市已非傳統上以血緣、地緣、親緣、學緣等初級關係所形成的地方派系，而是以經濟利益來維持對內團結與對外擴張所存在的都會型地方派系。2000 年政黨輪替後，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派系成員出走，加上經濟不景氣的衝擊下，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張派，為台中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二、 地方派系對各級選情之影響皆有不同

地方派系對於各級選舉的影響，可從三方面探討：(一)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派系在市長選戰中逐漸轉化為政黨間的對立。在相對多數的市長選舉中，派系的整合仍具有關鍵少數的效果，在無任何政黨可獲得過半票源的情形下，未來的市長候選人除本身形象與政黨奧援外，仍須要派系整合支持。至於派系直接參選市長的情況，以歷屆統計資料而言，只佔有 26.19%，平均派系的當選率甚至不到百分之十，可見派系直接投身台中市市長選舉的能力有限。(二) 在立法委員部分，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地方派系影響力逐年下降。第二、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擁有，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逐年

的選戰漸為稀釋。(三)在市議員部分，地方派系在參選爆炸的都會型選情中，派系人物參選比例就全部的候選人而言不算太高，平均為 27.87%，但是具有派系色彩的候選人當選比例卻相當高，平均為 82.96%。探究其背景可發現由於大環境的變遷，使得地方派系在面臨當選成效評估時，會以有限的資源支持較易當選之候選人。

另從地方派系的得票率觀察，具有地方派系色彩的候選人在 2002 年選舉得票率較上一屆為低，顯示政黨輪替後，台中市地方派系在基層選舉的選票動員能力上發生相當危機。

三、市議會已成為兩黨競爭體系

以歷屆市議員的當選名單中發現，大多數的無黨籍議員傾向國民黨，是故雖台中市議會已邁入兩黨競爭體系，國民黨席次率也大幅下降，但始終能掌握台中市議會的主控權；不過昔日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基層政治生態，依舊在新政黨的成立衝擊中，有逐漸弱化的現象。第十二屆市議會的有效政黨數目是 1.28，第十三屆市議會則漸增為 1.52，這反應了民進黨席次增強與新黨的出現，但仍然是屬於一黨制的範疇。第十四屆市議會的有效政黨數目為 1.89，這顯示民進黨與新黨仍維持基本席次。第十五屆為 2.63，顯示雖新黨式微但轉而是親民黨的出現，因此視為兩黨制。在泛藍的反對黨聯盟成形之後，如果將國親新三黨加在一起，則有效政黨數是 2.33 個，這幾乎已到了兩黨制的典型。

四、國民黨之組織動員能力逐漸減弱

即使張溫鷹已執政四年，民間社團的政黨支持並無太大改變，但國民黨在台中市的組織動員能力卻逐漸減弱，主要因中央與地方行政都易主、行政資源無法挹注，黨工無法接觸一些新黨友所參加組織的活動，自然會跟社會網絡脫離，加上選舉時民進黨執政團隊善用嚴格查賄等手段，國民黨與社團

間以及社團自身內部幾乎已無法維繫凝聚力。尤其在民進黨開始吸納因無資源而沒落的舊有組織與親民黨接收某些社團的些許力量後，國民黨更顯得欲振乏力。

五、 政黨競爭激烈導致地方派系擁有影響選情之關鍵選票

在市長選舉的角逐中，原本一直維持過半得票率的國民黨，自 1997 年以後只能獲得四成多的支持度，得票率呈現下滑的趨勢；民進黨則保持緩慢上升的態勢，甚至在 1997 年時首度超越國民黨八個百分點，但大體上仍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對決的局面。數十年來，台中市的政治版圖，一向是由國民黨與派系共治，第十三屆市長選舉顯示，國民黨倚重的地方人脈已出現若干崩離的現象。雖然地方派系的勢力已隨都市化的衝擊漸趨淡薄，但在大量獨立選民的台中市而言，兩大政黨五五波的對峙時，地方派系則擁有少數決定性的關鍵選票。

六、 選民呈現跨黨派支持取向

從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後台中市議員的選舉得票率觀察，1998 年派系得票率為 47.86%，2002 年派系得票率下滑至 33.13%，除了候選人本身派系色彩逐年模糊化並難以界定外，經濟環境的困境也使得具有明顯派系色彩的候選人，考量到競選必須大量動員與投入所費不貲的財力，而自然減弱參與政治場域的企圖。政黨在選舉時，也為了將基層版圖極大化，更習於提名現任者，現任議員因擁有服務績效與選區知名度而佔有較大的優勢。可見在高都市化的台中市，各政黨、派系與候選人在既有的人際網絡上，為了爭取大量中間選民的支持，政黨與派系的影響差異漸漸縮小，政黨間意識型態的界線逐漸模糊，選民投票之關鍵已開始從政黨與派系選項轉而傾向個人特質、形象、口碑或政見議題，因此基層選民受到不同黨派候選者的吸引而跨越黨派認同的界線也愈顯普遍。

七、 地方派系現未產生恩主之轉換

台中市地方派系因 2000 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內的分裂而導致張、賴兩個地方派系的部分成員政黨位移與各自獨立。不過從 2002 年市議員選舉中觀察，除無黨籍外，國民黨籍市議員仍鮮少發生政黨轉移，頂多為私底下支持親民黨，其偏向支持原因大多是選區內的選民多為外省族群或支持宋楚瑜，候選人必須為選票考量而改變色彩或屬性，但是具有派系背景的國民黨籍市議員台面上則並未發生轉向親民黨的現象，國民黨是台中市地方派系最大恩主的地位並未動搖。正如學者高永光所研究，因政黨輪替的時間僅兩年，且頻率不高，「恩主轉換」現象僅是初期的反應，致未明顯的「位移」。

八、 目前親民黨對地方勢力影響有限

2000 年以來造成台中市選民與地方派系對政黨支持變遷的原因，主要是「宋楚瑜效應」衝擊了長期為國民黨、民進黨所控制的地方政黨勢力。在選區內較多支持宋楚瑜的群眾下，候選人基於獲取選票的考量，其色彩亦較偏向親民黨，形成台中市地方山頭與派系人物發生政黨變動的主要原因。不過，台中市在既有地方派系兩黨化的現象中，隨著親民黨的成立，卻尚無邁向三黨化的可能，因為現階段的選民結構，親民黨雖然支持者眾多，但黨員人數依舊未大幅成長；再加上目前加入親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皆非地方派系重要領袖，所以目前台中市傳統地方派系並未轉變成三黨化的現象，仍維持國民黨張、賴兩派與民進黨何派兩黨化的局面。

九、 政黨與地方派系對得票率有顯著影響，然呈現下滑趨勢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台中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多元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迴歸分析結果呈現：(一) 1998 年政黨輪替前，派系與政黨兩個變數與台中市市議員候選人的得票率，均呈現正相關，且皆達

99%的信心水準。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具有百分之三十七左右的解釋變異的能力；即在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前，市議員候選人具有派系與政黨背景者，對於候選人得票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向相關。換言之，候選人具有派系或政黨背景者，得票率越高。

(二) 2002 年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兩變數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仍達到 99%的信心水準，顯見政黨輪替後，派系與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依舊具有顯著的影響力，且呈現正相關。不過，對於政黨輪替後的 2002 年第十五屆台中市市議員選舉而言，派系與政黨解釋候選人得票率之變異的能力降低（僅剩百分之廿六）。(三) 以 1998 年、2002 年兩次選舉，派系與政黨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之估計值加以比較，可觀察出隨著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候選人是否具有派系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呈現下降的趨勢。換句話說，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至於政黨變項，從兩次選舉統計結果可得知，候選人是否具有政黨背景，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程度已逐漸減弱。顯見縱然 2000 年大選後有多個新興政黨成立並投入選戰，但是在基層選舉上所強調的個人領導特質、政策主張、競選策略、棄保效應、個人式的基層經營與中央或地方的執政黨施政表現，甚至政黨內外的整合程度等，諸多因素之影響力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四) 再比較政黨輪替前後兩次選舉統計資料，觀察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得知，不論是政黨輪替前後，政黨對於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皆大於派系的影響力。

國民黨與地方派系間的利益資源系統分配了台灣地方資源數十年，因為政經環境的改變，此系統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邏輯重新調整，中央民意代表的參選開放，打破過去縣市長為地方派系爭奪最高據點的狀況。其次是政治環境逐步透明化，反對黨的監督效力增加，以及政治理念的大量宣傳，舊有的樁腳系統卻相對地日漸疲弱。第三是國民黨本身內部鬥爭不斷，多次主流與非主流的衝擊內耗，使得地方黨部組織與民

眾服務社系統都面臨分裂危機，昔日能有效操作選舉票源的能力自然每況愈下。第四是特許行業競爭力下滑，在開放的自由市場環境裡，農會信用部與信合社迅速失去優勢，連帶使依附其中的派系實力隨而下降。第五是民進黨籍縣市長很多出身非派系，因此採取刻意與派系保持距離的做法，派系無法再從行政體系取得豐沛資源，導致政經力量式微。

從台中市的個案研究可以發現，經過派系替代政策及兩次地方政權翻轉後，政黨政治的觀念已為大多選民所認知，派系影響力趨於淡薄，故現今地方派系重要角力是以市議會為主體，再搭配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合作夥伴關係。然而隨著派系日漸式微，政黨影響力大於派系，政黨為獲取最大利益時，依舊會使用策略性投票，進而導致台中市逐步形成泛藍與泛綠對決的兩股力量，與以往不同的政黨競爭型態，必然將影響未來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筆者對於政治環境變遷、地方派系影響、政黨政治發展與選舉制度的處理是以台灣獨特生態為本，以歷史觀察的立場來從事研究，因此在撰寫的過程，積極收集相關資訊，企圖以廣闊之視野來看待研究主題的整體性，然而由於台灣目前媒體多為片段不全之載述，在缺乏充裕詳實的資料提供下，以致無法用多面向之角度來處理，使得這份研究計劃在單一研究方法的限制之下，未能達到完全的多元化水準，而有未竟全功之感嘆。雖然台灣各縣市地方派系已存在多年，相關研究著作亦不勝枚舉，然而針對台中市地方派系個案研究的學術專著，卻不如其他派系鮮明之縣市，有著大規模地深入分析與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撰寫的過程中，除了文獻蒐集的考驗外，也面臨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等諸多挑戰，分別依述如下：

一、文獻資料蒐集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上，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與官方統計資料，雖然對於資料的處理務求完整性，但實際所面臨的困境是，因年代久遠或無法訪問派系耆老的情形下，難以尋求當時的背景資料，而有資料缺失之憾。尤其在台中市地方派系的專著與可資參考的相關文獻有限之情況下，解決方式有賴深度訪談與時事觀察方可獲致寶貴的資料，以彌補了部分缺憾。

二、個案研究

本研究是以台中市為個案研究對象，企圖探究在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前後，政黨與派系兩項變數對選舉投票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在個案研究的方法上，最為人所詬病的通常是對於此研究法是否具有通則化的問題；由於個案分析著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結論的代表性就可能受到質疑。此外，研究者是否具備主觀偏差（subjective biases）問題，也是深受質疑的，因為從個案的選擇開始，到資料蒐集與處理，均可能有主觀價值的涉入，而影響資料的蒐集及判斷。所以本研究為求較客觀的派系、政黨生態，而採取深度訪問法，在研究問卷的設計、訪談對象上務求公平與客觀，盡可能達到

平衡的效果。

三、深度訪問

本研究在深度訪問上，由於政治的敏感性，因而有兩項問題是較無法解決的。一則是受訪者為求表達自身的意見，有可能會於訪談時加入訪問者當時的對話與環境因素，甚至受到訪問者的技巧等干擾，而有偏頗。二則由於受訪者不是研究者能力所可控制的，因此有些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是必須訪問，但卻可能因當事人不願接受訪問或是沒時間等因素，而無法達成訪問。故上述的問題在尚未克服前，本研究在訪問之過程，仍有缺漏之憾。

四、實地觀察

由於寫作論文時間有限，而有不能長期從事田野調查之憾，此外尚有現實的困難。例如，受訪者與研究者各有不同政治背景，若只進行一般觀察，則難免造成浮光掠影，但要深入政黨或派系最核心的決策地域觀察，不僅困於政治現實之難成，又恐其他當事者知悉而心生畏懼，此為本研究之難處。

五、理論建構

一個學術上的理論建構，是眾多學者經驗的累積，加上花費諸多光陰的考驗。因此本研究在派系、政黨與選舉三者間之問題的假設分析上，並不一定能經得起時間之考驗；而資料邏輯推演的不周全、研究者的學識侷限等，都是本研究必須儘量克服的問題。

綜合上述諸多個人與後天環境條件不足的因素，以致本論文無法達到高度的完整性，心中頗有遺珠之憾。而研究方法和技術的限制，在其他研究方法和技術的補充下，筆者儘量維持研究的客觀。至於無法解決的部分，皆找尋可能的替代，而無法替代的，則有待日後的補正。